

蕃匪討伐 紀念寫真帖

遠藤寬哉／著

黃智慧／監譯・導讀
陳怡如／翻譯



導讀《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》：

1910年Gogan泰雅族群對日戰役

黃智慧

原書為出版在一個世紀前，以日本帝國和Gogan泰雅族群交戰為主題的寫真帖。不過，只從書名上，看不出來是對什麼族群的戰爭，內容是一幅又一幅背景為高山峻嶺、密林起伏與河川壯闊的戰地前線情景。不知名的人物、陌生的地名，再加上文字極簡，只有一篇短得不能再短約150個字的序言。這樣的攝影集，出版於日治時代前期1910年（明治44年）5月底，印刷與發行也都在人口還很少、區域甚小的臺北城內，竟然同年10月初就發行了第3版；可見，應該是備受關注的一本寫真帖。

攝影師遠藤寬哉（Endo Kanya, 1856-1925）在40歲時，從日本仙臺來到臺灣，開設了遠藤寫真館（1896年），本書《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》是他人生55歲才出版的第一本寫真集作品，隔年隨即出版《臺灣蕃地寫真帖》。一生雖只出版過二本寫真帖，當時名人記載事典，卻稱他是：「臺灣第一的寫真師，頗受信賴」。¹

會被這樣定位，自然有其道理，遠藤寬哉在臺灣業界遠比在日本活躍，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非常多次被提及，惜中文學界尚無專文研究，可說是長久以來被忽略的一位臺灣攝影史上先驅人物。本書旨在正確翻譯他的第一部作品，並將百年前的語言、地名、人名等做今日考證與註解。要穿越百年時空，障礙重重，本文力求為讀者描繪原書輪廓並探索其縱深，重新鋪出理解的各方路徑。

攝影師一家3兄弟

遠藤寬哉出生於江戶幕府末期，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。父祖原本是日本東北大勢力「仙臺藩」（伊達家）屬的醫生世家。他少年時正逢明治維新，幕府解體，世局驟變，或許看出了時代趨勢走向，在他這一代兄弟裡，有3位改行，選擇專攻一般人生活需要的新興科技攝

1 本寫真帖在短期內即發行三版為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明治44年10月3日報導。遠藤寬哉名字讀為Kanya，乃採用大正10年《臺灣日日新報》5月21日報導的注音，井上2012：59參考較多日本宮城縣寫真史的研究，注音為Kansai。近年對遠藤家族的寫真作品分析，日方研究參照大谷正2019。然而遠藤寬哉精彩人生舞台在臺灣，日方研究較少。更早期於明治40年11月17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曾報導由遠藤寫真館發賣《臺灣神社祭典紀念寫真帖》，惜臺灣國內未能找到原書，推測版權屬於神社，寬哉是餘興委員之一，所輯成紀念寫真帖未具個人名，尚難歸屬為遠藤寬哉第一部作品。



影業。

他的哥哥遠藤陸郎是日本宮城縣史上最早的一位攝影家先驅型人物，在仙臺開設「遠藤寫真館」（1878年），運用了新型的乾版技術。寬哉與弟弟誠2人跟著一起工作，還協助幼弟誠遠赴美國留學3年，學習最新技術；歸國之後，他們率先把仙臺的寫真店鋪外貌改成了美式風格。陸郎富有冒險犯難精神，在福島磐梯火山大爆發（1888年，死亡460多人）後抵達當地拍攝災難現場，也曾跟北海道千島列島探險隊，拍攝前人未到之境。甲午戰爭（日本稱爲「日清戰爭」）爆發（1894年），3兄弟成爲軍事攝影師，隨著仙臺第二師團，一起去了山東與遼東半島。

當時遠藤陸郎拍攝集成《戰勝國一大紀念帖》（爲山東與滿州作戰景象），戰爭結束後，下關條約簽訂，日本獲得第一個海外領土臺灣。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急切揮軍入臺，卻非一路平順，遭遇各地居民抵抗。此時他們3兄弟又隨著一起來到臺灣，由幼弟遠藤誠拍攝，輯成《征臺軍凱旋紀念帖》（1896年）。這本寫真帖記錄了軍隊來到臺灣的樣貌，也看到臺灣人從北到南抵抗場景，以及他第一次見到人民生活場面。這是日本領有臺灣之後，首度以臺灣爲主題出版的戰地寫真帖。雖然這2本寫真帖乃各出版於日本仙臺與東京，非在臺灣所易見，卻奠定了遠藤家族戰地攝影師的名聲。

1896年8月，寬哉決定一人先到臺南開創「遠藤寫真館」（打銀街）。3年後，日本仙臺本店結束營業，哥哥與弟弟2人舉家搬來臺南定居開業。此時寬哉把臺南店留給兄弟，自己來到臺北城內，再開設一家「遠藤寫真館」（府前街）。

不料，幼弟遠藤誠來到臺南後，隔年就英年早逝。之後，陸郎在臺南，寬哉則在臺北，持續經營民間寫真館生意。在此行業從事人口甚爲稀少的20世紀初始，常爲商工官民各業所辦活動做影像紀錄，也爲來到異地生活的人們，拍攝紀念照，寄回遠方家人。遠藤寫真館在臺北還率先引進了夜間攝影技術，也常爲報社提供活動報導的照片。²

2 見明治41年《臺灣日日新報》6月12日報導，之後數次報導皆強調遠藤寫真館可做夜間攝影；大正4年12月24日報導「以寫真技術與設備，在本島出一頭地之遠藤寫真館」正式導入高水準夜間攝影設備，當時日本全國不過五、六家擁有此設備，皆位在東京或大阪。

內容梗概

寬哉本人一直都還沒有獨自出過寫真帖，或許是曾有出入戰場的戰地攝影經驗，技術也受到肯定；總督府啓動「五年理蕃計畫」（1910-1914）時，這場1910年（明治43年）重要的序幕戰——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之役，總督府請他擔任戰爭紀錄的攝影師。


寬哉時年已54歲，明治時代日本男性平均壽命不超過50歲，這一役要離開臺北城內，往返奔走於廣大北臺灣高山地區（包含新北、新竹、宜蘭、桃園）的戰地前線，可以想像是很大的體力挑戰工作。

他從平地深入了高山叢林與斷崖峭壁，見證了這場幅員廣大、且戰況激烈的戰場。在人生所出版的第一本寫真帖裡，寬哉沉默不發一語。他內心的語言似要透過鏡頭，表達在每一幅拍攝的寫真中。

這冊寫真帖裡，呈現了宜蘭戰線124幅、桃園戰線20幅、新竹戰線23幅，加上最後收拾戰局10幅，總共177幅的寫真。讀者可以看到他克盡職守，記錄了最前線對戰雙方的日本這一方，包含警察（警部、巡查、隘勇）、軍隊（士兵、將官）及後勤工班（隘勇、築路工兵、補給）等人所處的險惡環境，以及臺灣北部的高山地形、地勢、河流與日方在行進、駐屯、開鑿道路的樣貌；還有交戰對象泰雅原住民族人的居住部落、山林環境、生活樣態。

除此之外，他的戰地寫真也包括以下場景，諸如：最激烈交戰的前線掩堡、砲台、鐵網、橋樑、電信、補給等戰爭設施，乃至於雙方和談模樣及偶爾喘息的休假日場面等。可以想像，他應該也看到了敵我雙方交戰的血腥慘狀，但是寬哉卻加以克制與避免，力求表達戰場多層次的面向。似乎他想讓平地的一般讀者理解，島內的山地仍在激戰中，與平地的日常生活是另一個世界。在戰場前線的平行時空，那是什麼樣的狀態？

遠藤既然受到總督府聘請而來，對官方人物得特別著力。寫真帖次序安排是，從討伐隊乘坐運送船「海扇丸」（基隆出發）到蘇澳上岸開始，對Gogan戰的大本營就構築在圓山。可見他從第一時間就搭船隨行，當時報紙也報導，他數度返回臺北，旋又回到戰場，一直到最後，隨著討伐隊伍回到臺北。



戰爭的結局是臺北城內有奉還軍旗等盛大凱旋式，這是總督府向世人宣告勝仗的表現，但與此對照的，寬哉不忘拍下戰死者慰靈式、追悼式，與在醫院大量傷病者的狀態，沒有太多欣喜氣氛。

在人物表現上，由於天皇侍從官在途中戰情穩定之後，來到大本營慰勞也鼓舞士氣，所以遠藤沒有完全依循時間順序，而是從位階表示敬意而排列順序。本書分成三部分區隔，地區上從宜蘭、桃園到新竹戰線，大致上沿著新開設道路推進來呈現，各分隊的軍警兵卒與基層開山鑿路的隘勇與築路工人都有顧及。

那個年代，日本對這些區域尚未有足夠認知，然因戰事進行之需求，地名就近以隊員人名來命名。在書中的寫真裡，對於戰時高地佔領、砲台設置地點與開路路線及戰略要地，爲了讓讀者理解，還特別給予A、B、C等標示註明。尤其在深入了綿延不絕的山形地勢，遠藤試圖用大廣角，以跨頁方式，意在呈現出泰雅人及部落所處千山萬壑之生存空間。

戰爭史的意義

筆者曾計算早從1896年之後到1920年，依照總督府的統計，日本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之間，戰備道路推進及大小衝突或戰役，至少也有155場（1920之後仍有持續小衝突）以上，這一段歷史時間還早於歐陸的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無論在日本史或東亞戰史上，皆是前所未見的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的遭遇戰，日方留存的一級史料甚爲豐碩，尙待世人加以研究。³

臺灣原住民各自成群，以部落社會的型態世居臺灣，且依島嶼之高山平原海岸地形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。19世紀末，日本要統治臺灣首先就要面對這生存區域佔島嶼最大土地面積的600多個部落。他們跟大清帝國互相對峙了200多年，大清也只能軟硬兼施，用圍堵、討伐加同化策略，在少數定點與人物略通交易，最好情況是互不侵犯，但實際往往沒有那麼理想。⁴

3 這些戰史以總督府相關機構編纂的《理蕃誌稿》、《臺北州理蕃誌》、以及《佐九間左馬太》與及時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從軍記者報導為一級史料。後續則有舊慣調查會的多本報告書、警務調查報告書，以及回顧或再訪的紀錄等（見入澤、樺澤）也有深入提及該戰役，本文皆列於文後參考文獻一、史料中。

4 清代最晚的番界紫線圖，參見林玉茹、詹素娟、陳志豪主編2015。

日本來到臺灣又能如何？一開始也只好學大清帝國的作法，用隘勇線來圍堵、用教育來溝通與用物質交易來掌控。只是日本有更好的國力，更優秀的科學探險人員與工具，他們認識原住民的世界，速度加快許多，不僅如此，日本還有更堅定的意志。甲午戰爭之後，拿下臺灣島本是意料之外，躋身在已風行全世界數百年的殖民擴張主義國家隊伍中，日本不過是後進國。在下關的談判桌上，李鴻章曾忠告伊藤博文，臺灣島上除了民性強悍的潮惠漳泉移民之外，還有雄踞十分之六島嶼土地的化外之民。可是，既然遼東半島拿不到，作為東亞新興小國，若能把臺灣治理得宜，也可以得到國際聲望。⁵


但是，到底怎麼治理，損益得失才能平衡？清國做不到的事，日本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前進。因此，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總督府之間，雙方並無過去的仇恨，突然的近距離接觸，除了巨大的異文化鴻溝難以跨越之外，更大的框架還在國際事務中，日本有其顏面的考量，而對島嶼內甫獲安定的本島人心，更要鞏固威信，往後不至於亂世再起。因此，在對原住民治理上，不能僅以利益考量，縱使付出了比其實際所得還要巨大的代價，也在所不惜。

對臺灣原住民而言，沒有文字，沒有國家與新式科技，只以部落或聯盟的規模來跟日本周旋，就勝敗局面來看，比較吃虧。但是之前清末光緒時代幾場對清戰役，泰雅族卻屢屢得勝，殲滅清軍。因此，從1896年日本到來後，南部排灣族先有小規模衝突，另一方面，在其他許多部落地區，用和談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時在進行，日原雙方都不斷在探測對方的實力與底線。

有些部落認為失去土地掌控權，擔憂獵場被限縮或有其他因素，仍以傳統出草方式解決問題。但是日方控制了重要的食鹽與生活物資交易，並嚴禁擁槍械與出草，把後二者定義為無法容忍的犯罪行為。

衝突的因素還有道路的開鑿、交易接觸與對外來者的疑慮觀念引起出草等種種因素，又以中部以北的汎泰雅族群最為嚴重。清代以來西北部中低海拔山區這個地帶，平地資本家從海外貿易得到的樟腦利益，也私設隘寮佈下防線，本來原漢（閩客）之間就衝突頻發，一方面原住民也從中與平地人走私交易入手槍械（土製或從海外），讓狩獵營生容易些，也保衛部落。

5 參見藤崎濟之助1928：905，說明了初代總督樺山資紀對理蕃的概念。



日本加入了這個戰局後，多群多族間利害關係，使得局面益加複雜化，樟腦因素只是其中之一。雖然，這個利益在1920年代化合物發明後就被淘汰，而居住中高海拔山區的泰雅、布農、排灣、魯凱與日本間戰役也與樟腦無關。森林資源若要開採，投資是否合乎成本也需考量。然而，這麼多的部落與族群，大小衝突幾乎年年都有。島內戰事一直延續到1926年，甚至可到1930年霧社事變，日本的整個統治政策經過大反省之後，才算平靜下來。其整體時間跨越甚長，區域極廣，內容也不是一般說法南蕃柔順，北蕃凶悍才打，更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決定要打，族群文化與部落社會各有其自主考量。

上述是本書戰爭史的背景結構因素，到了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1906年（明治39年）上任後再出現變化。佐久間乃長州藩（毛利家）低階武士後裔出身，幕末時期進入騎兵學校就讀，是一位從基層爬起，身經百戰升到陸軍上將的沙場老將。他到任時，其實1903年後，平地大致穩定，對原政策已經變化，轉為加強武力征討。尤其角板山（當時稱枕頭山）附近打得十分慘烈才攻下，總督府深知泰雅族群善戰，武力設備也多，打打談談，難以順服，益加認為只有集中強大武力，才能縮短時程，解決結構性問題。

佐久間總督原本順著前任作法，四處討伐征戰，幾年下來，研判成效不彰，決定先調整體制，把原民事務層級拉高到「蕃務本署」，如同今日行政院底下的一級單位，統籌更多的人力物力。由蕃務本署總長大津麟平籌劃「五年理蕃計畫」，1909年佐久間總督親自前往東京遊說，得到天皇與國會支持，才籌措財源，投入這場與原住民的大戰。⁶

【 戰役歷程 】

為何是從Gogan群泰雅人先開打？「五年理蕃計畫」的頭一場日原大戰除了大義名分，還有近因導火線。二條導火線首先是1910年初（1月29日）半夜時分，突然有Gogan群（一半是Knaji群）33人，翻越隘勇防線，過河偷襲位於平地的宜蘭九芎湖蕃務官吏駐在所，一舉殺警與其家族包括妻兒（含幼兒）造成9人死亡。當局大為震驚，全力追捕，後來查出是Krahu部落副頭目帶領所為，然其部落位處隘勇線之外，所謂「界外」之地，也無可奈何。⁷

6 當時後藤新平、桂太郎首相都持反對立場，但佐久間總督得到上呈明治天皇的機會，而獲得微弱的支持，利用此一回應，國會勉予同意才撥給預算。參見小森德治1933[2008]:525。

7 到底原因是什麼，為何要大舉偷襲這個平日只有3名警員與家族及數名隘勇的駐在所，而且滅首其中一名日本警官，甚至3名幼兒都殺，日方百思不解。《理蕃誌稿》記載只知是誰做的，沒有交代原因。《臺北州理蕃誌》原因有查，來襲者似乎誤殺了對象。見《臺北州理蕃誌》1923第4卷：95-96。

第二條導火線同一年4月初，因為宜蘭廳道路工程隊開修從宜蘭圓山到現在的大同鄉南山間道路，就在圓山附近，突遭原民30多人來襲，隘勇與工人7名當場斃命，日方退卻之後，翌日仍有日警在途中遭到狙擊重傷。調查結果是Gogan群Tglig部落所為，似為擾亂道路工程，也有警告意味，但也一樣，襲擊者逃逸無蹤，追捕無效。

這二起事件使得日本針對Gogan群泰雅人長久以來的疑慮，得到征討的名義。背後有周邊條件的配合，此即，附近的大崙坎前山部落群與溪頭群、南澳群都經過艱苦征戰，大致歸順，可得其助力，接下來可集中對付Gogan群。

1910年這場對Gogan群戰役，為總督府經過審慎評估，策劃縝密的結果。為此，還召集了臺北、新竹、桃園、宜蘭4位廳長（當時也是戰鬥位置的前進隊長）共同商議，由廳長擔任前進指揮官，各廳警力部隊加上招募更多的隘勇與道路工人組成前進隊伍。


由於考慮Gogan群向來與新竹的Mrqwang群與Knaji群系出同源，常有攻守同盟的結合，勢力可畏。為了先牽制這二群聯合，其實1910年的整個計畫，是先從新竹出動討伐隊，5月5日就先整隊出發，從油羅山方面推進隘勇線，往內灣溪上流前進。這個計畫立即遭遇到來自這二群的突襲與對抗，在艱困前進中，前後達7次進攻計畫，才達到目的，佔領了田勝臺等重要戰略位置，從左側壓制Gogan群的各部落。⁸

主戰線則是從宜蘭廳警力組成的前進隊，大本營設於圓山，編制6大部隊，加上隘勇、工人等上千人，稍晚從5月22日凌晨3點開始行動，上溯濁水溪，攀登芄芄山，意欲奪取要地，設置高地砲台，從右側予以砲火威嚇。

然而，這一來自宜蘭的隊伍打從開始，就遭遇到地形地勢與天候的大挑戰，初夏之後，梅雨加上颱風，在尚無道路的高山峻嶺之間，寸步難行，補給困難。進行不久之後，情資得知Gogan群大集結，分為大崙坎溪上游的右岸與左岸（含部分Mrqwang群），各就攻守位置，預備糧草彈藥，雙方大會戰勢不可免。

此時宜蘭廳圓山大本營評估敵我勢力，深知不妙，6月上旬緊急先向總督府請求軍隊支援，獲得總督府派遣臺北駐國的第一守備聯隊、砲兵及實習警察，約有500人員與精良武器

8 這次新竹路線道路推進戰，主要目的是對付Gogan群，但也是前哨戰，埋下了前因，翌年日方就攻打李崙山以及Mrqwang群與Knaji群的部落，展開全面交戰。



趕往宜蘭馳援。確實，在軍隊趕到之前，6月上旬只靠宜蘭廳警力隊伍，連喫敗仗。猛烈砲火使得前線受阻，後方又被截斷補給，工人與原本協力的溪頭群逃兵四散，前線呈現彈盡援絕的狀態。且對陣時，雙方都有「諜對諜」情報戰，且打且談，互探虛實。甚至等6月中旬援軍重砲部隊抵達，一時也無法適應戰場，軍隊陷入苦戰，傷亡犧牲慘重。

宜蘭戰線一直持續糾纏，打到8月底，日方佔領了復興尖山高地，並進軍到巴稜山鞍部，新竹戰線方面也攻佔鳥嘴山與李嶺山鞍部，此時來自左右雙方夾擊，不斷地在制高點，以大砲轟擊示威，戰局才開始扭轉，雙方逐漸轉為鬥智談和。

而桃園方面一條前線，本來大崙坎前山群Msbtunux數年前經激戰打過而歸順，故此線乃是道路建築工事，雖然斷崖險峻，行進極為困難，但並無戰事。桃園前進隊在戰局抵定後，9月才出發，下旬即與從宜蘭與新竹推進的戰線與道路工程隊，三方在Tksan部落（現在的上高義）附近會合，日方才首度推進到大崙坎溪上游深山地區。此後，數度和談、招撫、協商，並帶族人到臺北觀光等手段來溝通，使對手願意放棄武力對抗的想法。這場戰役也一直到了11月底，宜蘭、新竹、桃園三前進隊伍陸續解編，才算整體結束。

所謂「五年理蕃計畫」（1910-1914）中，期間包含多場戰役，其實總共只動用過三次軍隊武力。這三場即是本次的Gogan戰役與1913年Knaji戰役，以及最後1914年太魯閣戰役，其餘皆是警察與隘勇工兵組成的討伐隊，可見這場Gogan戰役的重要性。這一點也讓近年日本的戰爭史研究者認為，日本戰爭史的研究上，忽略了這個時代在臺灣戰事，尤其這段1897—1914年間，不論是日本在平地人地區的對抗稱為「匪亂」或者在「理蕃」計畫的各戰役上，應該稱之為「日臺戰爭」或日本的「殖民地戰爭」，不是武力抵抗的民族運動或事件、討伐、推進等名詞可以含括其意義。⁹

雖然在戰爭史研究上，還有很多可探討的空間，然並非本書作為一本寫真帖足以說明概括，何況Gogan戰役的歷程頗為複雜，交戰的雙方皆殫精竭慮，攻守之間，過程十分壯烈，篇幅甚長，並非本文導讀之目的，容另文再敘。但確實，一開始總督府沒有想要動用軍隊，因宜蘭戰線開打後，警察部隊帶著工兵大隊人馬，一邊登高山開新路，一邊要運送重型武器，不是世居高山峻嶺，熟悉地勢天險且英勇應戰的泰雅人對手。

9 參見檜山幸夫2011，近藤正己2015的討論。

隨後大津蕃務總長急忙趕來坐鎮大本營，臺灣守備軍司令官與參謀官都趕過來協助，讓宜蘭戰線經過數度整軍，檢討敗因，投入更多人員與裝備，備嘗艱苦之餘，才逼使對手繳械談和（日語稱之為「歸順」，泰雅語稱之為「msblaq」）。而泰雅族人之善戰，也從對手學習，戰技精湛，令日本兵士後日回憶時仍十分讚嘆。¹⁰

因此，作為「五年理蕃計畫」序幕的Gogan戰役這場硬仗，時間遠比預期的長，耗費人力物力也超出原先規劃，這一戰，更牽動昭告天下的「五年理蕃計畫」後續各場戰役到底能否順利完成，自是各界都關注的焦點。


透過寫真帖所傳達的戰役

似乎一直到這場戰役之前，在20世紀初期的年代，到底Gogan群泰雅是哪些人？哪些部落？什麼樣的地形地勢？日方都尚未進入測量過，不太清楚。為了讓讀者理解這場戰役，遠藤寬哉自行製作了一張簡易的等高線加手繪的地圖（參見本書原圖）。如果總督府已有測繪地圖，已知部落位置等高線，那麼遠藤借用即可，何必一個民間寫真業者，耗費氣力來畫一張看起來有點拙稚的地圖？其間道路、橋樑、部落、斷崖都是手繪位置。筆者認為，軍方或警察部隊出動討伐，以當時歷經與清、俄戰事之後，部隊也有其作戰地圖。遠藤或許有參考，但是並沒有直接使用軍隊作戰地圖（否則引用陸軍部印刷等地圖即可），這似乎也透露，他想用讓普通民間人易懂的方式，去製作了一張為理解本冊寫真帖所在位置的地圖。

仔細閱讀後，筆者發現，雖然這一本寫真帖，僅只有一張手作地圖，卻相當正確而詳實，傳達了許多第一手訊息，屬於當時對此區域人群部落地圖製作的先驅。這些訊息包含：

(1) 對手是誰？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Gogan群泰雅人的部落與附近河川（大崙坎溪上游）流域分布的關係。圖上這麼多的部落，大概是遠藤所知範圍，跟著前進隊，他並沒有畫出區分其不同群。其實，這些部落從北往南，包含了Msbtdux群（被稱為大崙坎前山蕃），以及Mrqwang群與Knaji群，為了讓這次戰爭的主角們更清楚重現，筆者標示當年Gogan群19個部落的位置（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）。可以看到他們的部落都在大崙坎溪上游流域之旁，雖是高山族群，其生態環境卻與河川相依共存。

10 關於泰雅族人的戰技與和解概念，參見1915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第一卷泰雅族第六章仇敵關係。Gogan戰役之後，曾有退休警察前往訪查，寫成記錄出版，參見入澤滲1922年生動的描寫，以及老兵樺澤重次郎於1935年，戰後25年記憶猶深的痛苦回憶。



當年是17社，還是19社？對照一級史料《理蕃誌稿》第3編下卷（1921年整理出版，《臺北州理蕃誌》亦同），寫到Gogan群是泰雅族北部的大聚落群，共有17社所構成，戶數380多戶，人口千餘人。然而1915年先於此出版的「臨時舊慣調查會」所編纂的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卻記錄了19社，戶數374戶，人口2187人。後者的數字非常明確，應該依據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所做首次番社戶口統計，也應該是此一戰役結束後，新設了分遣所等據點後，調查出來最準確的算法。

比對遠藤製作的地圖，他標示出了其中17個部落，卻有2個部落遺漏。這2個是Sbnaw和Ibaw，然而在前述史料中，這些部落都存在，今日也尚存。由於部落位置會變動，大正4年的《番社戶口調查》也是17個部落。補上了該2個部落之位置，以最多的19個部落為計算，重新標示（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）¹¹。

以此圖可以看出Gogan群依河川較大的主流，又可分成右岸和左岸的部落群。右岸從北往南為：Sbnaw（スブナウ社），Tkasan（タカサン社），Hagay（ハカイ社），Qara（カラ社），Ibaw（イバウ社），Bsyal（プシヤ社），Balung（バロン社），Pyasan（ピヤサン社），Kulu（クル社）。

左岸則從北到南的分布為：Piyaway（ピヤワイ社），Kwilan（カワイラン社），Suruw（ソロ社），Btwan nokan（プトノカン社），Sarut（サルツ社），Zihing（エヘン社），Tgliq（テリーリック社），Hkawan（ハカワン社），Ngurus（コロス社），Krahu（カラホ社）。

從此圖可知，Gogan群泰雅人果然是雄踞臺灣中部以北深山區域最大的部落群，對總督府來說，實在是「莫測高深」。其人口數在整個中部以北，只有比起東南方的南澳群少一些。但是比起西臨Mklapay群，南鄰的Knaji（金納吉群），Mrqwang（馬里光群），北方的Msbtnux（大料坎群），Mstranan（屈尺群），以及東方的Mnibu（溪頭群）的人數與部落都要來得多。

11 這也是筆者認為該地圖是遠藤繪製的原因，可能雪霧鬧與Ibaw這二個部落沒有戰事，他沒有去。若是引用軍隊地圖，不至於漏掉。

而且其所處的位置，恰好被這些周圍的泰雅群包覆在中，也就是說，Gogan群不與平地人的村落鄰接，部落群之內應該沒有隘勇線與交易所的設置，而要透過周遭族群間接交易（例如要遠到深坑、角板山），所以該群的詳細人口與位置，難以為外人所探知。這也是為何要攻打Gogan群，必須動用臺北、宜蘭、桃園、新竹四廳的警力隊伍，因為Gogan泰雅的部落群四周圍憑據天險，易守難攻。


也正因如此，日本留下的戰爭史料其實對部落內部訊息還不很明朗。這一次的戰役，是否19個部落都有參與並不清楚。只知前一年陸續已經有9社開始跟日本談和，如前所述，日方只要控制食鹽與物資，嚴禁交易，就有機會迫使歸順。但是另有8社卻毫不理會，而導致爆發戰役的前述2條導火線，也是在後者部落之內。除此之外，加上河流左岸部落這方，也有西南的Mrqwang2個部落參戰。日本懷疑有平地漢人進入其中，從中交易武器獲利並藏匿於山中煽動，故本書的書名被定為『蕃匪討伐』是少見的名稱，把蕃與匪二者加於一起，可能有此意涵在內。

(2) 戰爭場域在哪裡？遠藤所繪地圖內，用點點虛線標示出「討伐中新設道路」，亦即分別從宜蘭、新竹、桃園戰線推進的方向。尤其從宜蘭的推進方向，可能遠藤都有參與，所以路線相當清楚，而高台、合流點的位置也都有標示。

桃園的路線也是，當時有二條路線在猶豫，到底要從左岸築路還是從右岸開鑿，他都有繪出。比較不太令人明瞭的從新竹線的推進，因為有七次行動，各條路線的推進可能受阻，又生變化，且遠藤也無法分身，所以左方比較不清楚，圖上最後也沒有連起來。不過史料上記載，是宜蘭線大致抵定後，到Sbnaw與桃園線相遇，然後一起到Tksan，與從新竹左方開鑿來的隊伍相連結。

這應該是首度不以周邊大範圍隘勇線圍堵Gogan群的方式，而是長驅直入，循河流佈局於中線的方式，來完成道路。沿著道路即可駐紮警備，牽電話線聯繫，日方認為比較經濟節省駐屯人員與其家族的費用。三方向的路線圖重製（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）。

(3) 此張地圖上，也因這場戰役而標示了新產生的地名地點。這些新給予的命名地點，其實也如同泰雅族的命名方式一樣，雖然都以日文命名，有的是為了紀念某人的英勇或戰歿事蹟，也有必須辨識戰略地點之需求而加以命名，例如：田丸合流點的田丸，是當時的隊長的



姓氏，漆崎是紀念他的英勇事蹟，上野則是紀念他的戰歿，有的地名還留存至今日。這些新地名重製標示（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）。

以文字而言，寫真帖最先依當時的慣例，請最高官階佐久間左馬太大將（也是總督，號為「研海」）題詞「開發皇土」，接著請前後任第一守備隊司令官小泉中將與野島少將題詞。

重要的序言，寬哉請最前線帶隊指揮官，臺灣守備步兵第一聯隊長奧村信猛上校來撰寫。奧村出身於石川縣，當地原為江戶幕府第一大藩屬「加賀藩」（前田家）。但他不只是一介武夫，還熟稔德語，研究兵書。在東京時，便曾翻譯出版當時歐陸新興強權，普魯士軍隊的治軍著作。¹²

奧村在這一篇極為簡短的序文中，呈現看似勝仗，卻無喜色，僅以「在瘴煙蠻雨中，付出了重大犧牲，總算達成大目的。」數語道出這位身經百戰的軍官，感受這場戰役很值得紀念，卻不算勝得光彩。他形容交戰對手「瘴猛兇惡」，但也軍人本色，尊重對手乃視敵首為其「唯一的生命道德」，從此話可知他理解對手並非可恨的犯罪對象。

所謂戰爭的勝敗得失其實很難計算，當年史料中，只知三線合計，當場日方人馬戰死傷損失461名（陣亡149人其中軍官士兵佔79人），各類的受傷生病者（生病救治以瘧疾、消化器及槍傷外傷最多）統計高達7,872人次。從這個數字來看，對手加起來頂多上千人泰雅勇士，其死傷數字不明。而從前述大正元年的人口統計仍有2千多人來看，推想不至於太多。可見前述奧村信猛連隊長並無誇大其功，或許還有些擔憂，因為，這才是開始的第一仗。

在短短的序言之後，依當時慣例，把統帥們肖像寫真排列在最前；一翻頁，即是命喪在臺灣高山叢林的官兵照片，二者形成強烈對比。寫真帖呈現中，寬哉對戰歿兵士遺骨，給予近照處理，對於其陣亡或跌落瀑布而死的地點也加以記錄，沒有隱瞞日方付出的慘重損失與代價。

寫真帖對於原住民Gogan泰雅人拍攝較少，衡量當時的情境，遠藤可接近的機會並不多。即令如此，他還是努力呈現對手的模樣。有一家族把家財道具都擺放在屋前，顯示泰雅人樸實無華的生活。女性們展現織布手藝傑作，男性們聚在一起有點拘謹的模樣，還有一張和談時的微妙氣氛等，這些場面似沒有要醜化敵方的意圖。

12 奧村信猛時任陸軍上尉，與平澤耕作少尉合譯。原作者為普魯士陸軍中尉Balthasar，日譯書名《下士の職責》，下士即最基層的班長，1899年（明治32年）於東京兵事雜誌社出版後，發行5版。

本冊最後2幅寫真，遠藤把收繳的槍械與泰雅人傳統武器，並列在一起作為結尾，而且在博物館特寫拍攝。這場戰役在日方的戰功記錄裡，前前後後Gogan與相關附近的泰雅人一共繳出了1,110支槍枝。遠藤好像要說，付出這麼多死傷代價，無非是為了這些槍械，似乎對照了蕃務總長大津麟平說過的話：「蕃人無罪，擁槍有罪」，其意味深長。¹³

攝影史的意義

讀者從遠藤寬哉第二本《臺灣蕃地寫真帖》作品才知，在Gogan戰役之前，從1907年起至1912年（明治41~45年）的理蕃戰役，其實他即出入在交戰前線，拍攝過戰役樣態；他去過南部、中部與東部深山，甚至於蘭嶼部落，拍攝過各族樣貌，可見對原住民已有一定的認知。

在當時沒有鐵公路的交通條件下，這麼吃重的出入前線陣地的工作，見證戰禍與苦難，或許身心都難以負荷。緊接著1914年總督府與太魯閣群的大戰，就由寬哉的兒子遠藤克己來承接（與臺灣日日新報社柴辻誠太郎共同），拍攝作品編輯成《大正三年討蕃軍隊紀念寫真帖》，該書即是遠藤這一家族二代，所出版最後一本寫真帖。哥哥陸郎先於1914年逝世，寬哉驟逝於1925年，那時他正好出差東京，所以遺骨由兒子抱回臺北。¹⁴這一家遠從日本北方仙臺飄洋渡海來臺、打拼事業的3兄弟，至此結束後半人生舞台於臺灣。


從臺灣早期寫真歷史來看，本寫真帖不是最早的原住民寫真，但卻是記錄日本與原住民族戰爭的第一本戰地攝影的經典作，也是民間首度在臺灣出版，能夠被自由購買，容易被大眾所閱讀的戰地寫真帖。

臺灣原住民的影像紀錄在19世紀中葉攝影機技術發明之後，少數來自歐洲、加拿大的探險家、傳教士即有留下。本書主題特殊，對臺灣原住民記錄的時代也很早。以戰地攝影而言，早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「征臺之役」，就有日本史上最初的隨軍記者做了攝影紀錄，可惜迄今除了一張照片之外，寫真帖沒有留下。

當時二名隨軍記者中，一名死在臺灣。前線戰地記者的危險性，跟今天世界上正發生的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巴勒斯坦等戰地現場，幾乎沒有兩樣。但身處於和平生活的大眾讀者，卻最想知道平行時空的遠方災難與戰爭實況。

13 小森德治1933[2008]：519。日方繳出的槍枝與戰功及損失，參見1921《理蕃誌稿》第2卷第三編下卷：674-680。

14 參照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大正14年12月15日報導。



比起文字記者的生動描繪報導，攝影更傳達了某種真實性（雖然也是部分真實），閱讀者能印證或更正或擴大自我的想像，這使得日本攝影史上戰地寫真帖，在新興小國日本打勝大清帝國與帝俄二大強國之後，因國內讀者以眼見為實的大量需求，而迅速發達。

提早一步來臺開業的遠藤寫真館，經歷過過甲午戰爭與臺灣乙未之戰，應知甲午、日俄二場戰地寫真帖大賣熱銷，當時引起業界檢討其出現的各種問題點。¹⁵ 戰地寫真可以迅速發揮功效，以視覺令人易解易懂，但也潛藏誇大與選擇性的宣傳效果，一方面，卻又具影響民意及輿情，以致後續可帶來檢討政策的可能。

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學術攝影，在東亞世界裡更是開始很早，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背負著厚重玻璃感光底片，在原住民各地拍攝了許多照片，不僅是人類學先驅研究，他的書信短文也讓日本民間社會認知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習俗。¹⁶ 1899年雖然是他率先於日本學界出版了學界最早的《人類學寫真集：臺灣紅頭嶼之部》，但是這部寫真帖由東京帝國大學所出版，且專於一族。而其他許多張玻璃底片的各族精緻寫真，存藏於東京大學校內，外界不易入手，臺灣民間仍無法得知島內原住民生活空間的狀態。

介紹臺灣的寫真帖1900年代先有數冊出版，卻以平地為主。因此，雖然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經常以大篇幅報導原住民的出草、蕃害、反抗、歸順等事件，前線記者描述非常生動逼真，可是一般人究竟難以得知原住民山區現場是何樣貌？尤其是「隘勇線」這個名詞，對日語讀者而言，在日本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，西方世界也難以認知。

時間要到1908年，首度以「隘勇線」為名的寫真帖，由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課編輯出版。那是一本很薄的小書，名為《臺灣蕃族界及隘勇線》，內容甚淺，僅簡要介紹各族群文化，關於隘勇線，既無任何文字說明，寫真也只有9幅，佔不到該書3分之1。與遠藤這本書同年於3月，蕃務課先出版了英文撰寫的報告，書名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。該書相對比較完整介紹原住民各族群習俗文化，很少幅的寫真部分，被認為是森丑之助所攝。¹⁷ 文字內容有簡短說明「隘勇線」由來（原書英譯寫成Guard-Line）等，寫真10幅皆為靜態的隘勇線模樣與人力，文字簡短地介紹1906-1908年隘勇線推進的小戰役，其介紹的戰役，年代正好在遠藤這本書處理的Gogan戰爭之前。重點是前二書

15 參照井上祐子2012。

16 參照黃智慧1994。

17 對臺灣原住民寫真史的先驅研究，見許進發、魏德文1996。

皆為官方所出版，非民間市場容易購得，後一書更是純用英文出版，當可理解總督府想要對國外說明與宣傳之目的，訴求對象排除了島內日語讀者。

這些當年時代背景因素也可解釋了，為何當遠藤寬哉這本討伐寫真帖出版後，立即引起熱銷的原因。本書應該是島內廣大民間人士，首度可得知與原住民戰爭前線狀態之完整寫真帖。當然，能出入戰場的隨軍攝影記者，有其必要傳達官軍所需的使命存在，但本書又是民間人編輯的出版品，和先前官方編輯的二書就產生了區隔，成為奇妙的二者視點兼顧的寫真帖。

有此一機會可發出自民間人的視點，遠藤寬哉到翌年第二本作品《臺灣蕃地寫真帖》出版時，就表露出來。他說：世人都誤解了臺灣原住民族群！可見他想傳達的，有來自於他個人獨到的心得與觀點。


結語

19世紀後葉，寫真是一門方興未艾的行業。臺灣處於日本的外地，在資訊傳達上，遠方渡來的人民與統治者，皆立即產生各種各類的需求，包含自然景物、人文風俗等，不僅總督府在資料收集以及學術應用等有各類用途，也吸引不少人投以獵奇商業的眼光來拍攝饒富趣味的民俗風情，因此產生了大量寫真帖出版，其中難免摻雜有參差不齊的現象，不能僅以「帝國之眼」一言以蔽之。

在臺灣原住民族所居領域的早期攝影上，早期有日本皇室宮內廳收藏的寫真帖，以及出版資訊不明的七腳川社討伐寫真，都不是民間社會所能一般購買閱讀。¹⁸尤其在Gogan戰役後續，發生了太魯閣戰役、霧社事變、甚至於後來各類施政成果與紀念類型的寫真，以至於到更大動員的二次大戰時期等，在20世紀前半整體寫真帖的數量，都壓倒性地多過於初期的理蕃戰役。因此出版於110年前遠藤寬哉的Gogan戰役寫真帖的價值，混跡在海量的寫真帖史料中，就容易為後世研究者所忽略。

以昔日寫真技術要保存百年以上確實不易，要貼近當時複雜的族群歷史背景，更需耗費一番工夫，才能穿越重重障礙給予解讀。原書不同於現代日文，當時是明治期，以片假名為

18 在本書之前，日本皇室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早期蕃界攝影資料（1903-1925），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有數位典藏，參見陳柏棕介紹文。然而這批攝影史料不清楚攝影者為誰，也無編輯說明，當年也不可能被皇室之外所看見。此外在Gogan戰役之前，1908年日本對花蓮七腳川社討伐戰，有頗為完整清晰的寫真帖被發掘，而在臺譯成中文出版，有助於史料研究，可惜缺乏攝影者與文字作者、年代及是否有被出版等資訊，參見陳聰民等編2005。



主、且順序乃從右往左寫之典雅日文書寫體，須具備對明治期日文與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背景知識之理解，才能推敲適切的中譯文。

且百年前的文獻，書中的泰雅語皆以日文拼音書寫，由於日文假名也是表音文字，當年聽到的音，可以直接記錄下來，對日文來說很方便。然而中文為表意文字，以聽音拼寫會造成音調與字義變化。時序經過百年來，泰雅語言的書寫系統已經逐漸確立，故本書不僅給予適切中譯，也力求以今日泰雅語書寫系統來復原成原語。¹⁹百年期間，遇到政權更迭，泰雅族部落位置也歷經變遷，且有不少同名部落容易混淆，此為泰雅族群的命名習慣，故需要給予多層解讀與考究，分辨今日部落山川名稱與位置，如表1。

在地名原語復原與位置考證上，本書參考了1915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第一卷泰雅族，1917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第4冊紗積族及1918第5冊、1920第7冊大夭族，1923《臺北州理蕃誌》，1931《高砂族調查書·蕃社概況》第5冊，以及戰後林修澈主編2018《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》等書籍，加上比對今日Google地圖與請示泰雅耆老等作業過程。這些工序繁複的工作中，所幸得到許多泰雅族文史專家與耆老協助，幾乎所有泰雅語都得到復原與考證註釋。²⁰

湮沒百餘年後，本書重新問世，除可一窺百年前北部泰雅族人所居壯麗山川之生存空間，也見證了一段日、原、臺三族群交會的戰爭史。希望給有興趣於臺灣攝影史、原住民史、日治時代史、戰爭史、軍事史甚至東亞戰爭史的朋友們更好的史料佐證。

19 本書泰雅語拼音系統採用Masa Tohui（黃榮泉）之教導，參見黃榮泉、黃智慧合著1996之說明。

20 感謝鄭光博（Watan Kahat）博士在原語復原及地名對照上大力協助，文責仍由本人自負。也感謝Iban Nokan（伊凡諾幹）、Yuma Taru（尤瑪達陸）、Jiro Jima（許再發）理事長、Kuoyung Silan（宋國用）、Sabi Batu（賴清美）館長協助解惑。尤其感謝Gogan泰雅人Omi Wilang（歐蜜偉浪）牧師，賜知他的部落未曾遺忘的歷史，卡拉部落至今流傳一對兄弟當年山谷砲聲隆隆仍奮勇抗敵的事蹟。

表1：《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》原語復原與註釋表

(1911[明治44年], 遠藤寬哉, 臺北: 遠藤寫真館)

日文原文	泰雅語書寫拼音	註釋
宜蘭方面		
バヌン	Banun	今日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內的碼崙部落。
バコン	Pagung	位於今日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英士部落隔芄芄溪對岸之山頭。原在地族人除極少數留於該地，大部分族人已經移住Skikun（四季）部落。pagung為螢火蟲之意。
ボンボン山	Bungbung山	今日之芄芄山。據稱是因過去有許多bngbung（熊蜂）而命名，後來山名轉為Bungbung。高度甚高，被視為該戰線第一座戰略要地，運送砲台至附近高台。
旗山		今日宜蘭縣大同鄉境內，原為日方在此戰役中的軍隊前線基地，因其為安置軍旗地點而得此名，沿用至今。
カラホ社	Krahu社	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嘎拉賀部落，亦稱為新興部落。
ボンボン溪	Bungbung溪	今日仍稱芄芄溪，在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附近。
パラ山	Para山	此地為宜蘭大同鄉Bungbung溪與Kulu溪山頭的鞍部所在，泰雅語稱Quri Para，日本當時簡化稱為Para山，今日該名仍留存，稱為婆羅山。
シナレク山	Snariq山	今日宜蘭縣復興尖山（又稱：尖山），寫真帖中出現多次，是本次戰役的重要戰略要地。高度難以攀登，卻可眺望山谷中各部落。
クル山	Kulu山	應在今日北橫四稜附近，尖山的西側，舊Kulu社的北方屏障。
シナレク溪	Snariq溪	在尖山的東方，今日三光河流域之一。
バボークル山	B'bu Kulu山	今日宜蘭巴博庫魯山，又稱馬望來山，是北橫第一高山。位於臺北、宜蘭、桃園的縣界上。

ミヨート山	由日文發音「夫婦」(meoto)而來	今日桃園復興區之夫婦山。在寫真帖裡有標示在A點巴博庫魯山的左方B點，高度頗高。
コロン山		似為今日桃園與宜蘭交界之稜山，原書地圖上有標出其位置，在チャコン溪(Cyaqung泰雅語是烏鴉之意)西南，西村合流點南方。也是舊Kulu部落的東方屏障，寫真帖標示為G點山頭，高度甚高。
ガオガン蕃社	Gogan蕃社	現在非指單一社名，而是一個群體。在本書的年代，沿著大料崁溪(今日之大漢溪)上游，稱為Gogan溪(今日稱為三光溪)，居住於三光溪兩岸的泰雅族人聚落。包括桃園市復興區三光、華陵、高義里一帶。1910年當時有19社，300多戶，約2千人的大族群。
クル社	Kulu社	在桃園復興區華陵里嘎拉賀部落的對岸。依據臺灣總督府《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(泰雅族篇)記載，本社和Bsyal, Balung, Piyasan, Ibaw, Qara都是Gogan群，共組攻守同盟。當時是戰役主力部落，今日部落不存，大部分人遷往宜蘭松羅部落，少部分遷往桃園嘎色鬧部落。
バロン山	Balung山	今日之巴陵山，泰雅語balung是倒下的巨木之意。
ハカワン社	Hkawan社	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哈嘎灣部落，亦稱為光華部落。
バロン社	Balung社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巴陵部落。緊依著巴陵山，後來附近的Bsyal社也與本社結合。
ピヤサン社	Pyasan社	今之地圖標記為比雅山或埤谷山，周圍今日皆為果園。該山以piku鼬獾為命名。Rgyax Piku位於今復興鄉華陵里境內，塔曼山向西延伸而成。
テエリツク社	Tgliq社	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鐵立庫部落，亦稱為復華部落。泰雅語tgliq為瀑布之意。
ブトノカン社	Btwan nokan社	今日稱為武道能敢部落，也是復興鄉三光里辦公處所在地。
タマン溪	Tman溪	大料崁溪流域支流塔曼溪，位於今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。泰雅語tman是座位、安置處之意。

プシャ社	Bsyal社	Bsyal部落是今日華陵里下巴陵部落。泰雅語Bsyal是殼斗科櫟屬植物「赤皮」之意。與Balung社非常靠近，1930年代時似乎已經併入Balung社，不呈現在高砂族調查報告書中。
マリコワン溪谷	Mrqwang溪谷	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境內，三光里以上稱為馬里光溪。Llyung Mrqwang為大崙溪流域上游馬里光／馬里闊丸溪。
エヘン社	Zihing/Gihing社	位於今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爺亨部落。因各地方言發音略而不同，桃園復興的唸法是Zihing或是弱化成Yihing，尖石義興Mknazi群的發音則是Gihing。該詞意指不易受日照或背陽之處。
ソロ社	Suruw社	位於今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蘇樂部落。現在又名為中高義部落。Suruw意思是頭目居地之意。
カオリヤン社	同於カオイラン Qwilan	今日之桃園市復興區上高義部落。
タカサン社	Tksan社	舊高義社位於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下蘇樂部落的對岸半山腰，與雪霧鬧同側。
天長節		戰前定日本天皇生日為「天長節」國定假日。字源從中國唐玄宗生日被稱為「天長節」而來。日本天皇各任的生日不同，明治天皇是11月3日，大正天皇為8月31日，1948年起的昭和時代不再稱天長節，改稱「天皇誕生日」，歷經平成時代，迄今仍是日本國定假日。
ララ溪	R'ra溪	大漢溪上游支流之一，源自拉拉山。今日桃園市復興區卡拉（Qara）部落附近，名為卡拉溪。拉拉（R'ra）泰雅語原意為「踮腳尖眺望之意」。
桃園方面		
合脞坪	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雲霞坪。
ラハオ	Rahaw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之溪口台部落。
ギヘン	Zihing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義興部落。

キヨパイ	應為キヨパン， Kinyopan。	今日之復興區羅浮部落所在地。
オライ溪	Ulay溪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宇內溪。
南九母社	南Kobuw社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高坡部落，後來加上其他部落來此，現在已經無分南北社。泰雅語Kobuw是魚荃之意。
北九母社	北Kobuw社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高坡部落。
新竹方面		
樹杞林		今日之新竹縣竹東鎮所在。地名因該處多橡棋樹得名為橡棋林，取其音，清代稱竹塹堡樹杞林庄。1920年後，改名為竹東。
プロアン	Pbrwan	今日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福路灣部落。
ラハオ社	Rahaw社	今日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拉號部落。與桃園的溪口台部落同音。
カウギス社	Qyuws社	為今日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的下田埔部落。
中之島		似為今日尖石鄉新樂村拉號部落附近的鐵嶺。
カオイラン社	Qwilan社	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高義部落。

表2：二十世紀前期度量衡對照表

日制長度	公制長度
1間	1.818公尺
1尺	0.303公尺

出處：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。「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。」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，2011。http://doi.org/10.6681/NTURCDH.DB_THDL/SERVICE/measure

參考文獻

一、史料（依出版年代次序排列，同一著作者為先）

鳥居龍藏

1899《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》，東京：東京帝國大學。

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課

1908《臺灣蕃族及隘勇線》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。

Bureau of Aboriginal Affairs, Government of Formosa

1911 *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*，Taihoku: TōyōPrinting co.

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編

1911《治蕃紀功》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。

1913《理蕃概要》，東京市：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。

遠藤寬哉

1911《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》，臺北：遠藤寫真館。

1912《臺灣蕃地寫真帖》，臺北：遠藤寫真館。

成田武司

1912《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》，臺北：成田寫真製版所。

岡野才太郎

1912《蕃務要領》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。

岩崎潔治

1912《臺灣實業家名鑑》，臺北：臺灣雜誌社。

柴辻誠太郎

1913《大正貳年討蕃紀念寫真帖》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。

1915《太魯閣討伐寫真帖》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。

遠藤克己、柴辻誠太郎

1914《大正三年討蕃軍隊紀念寫真帖》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、遠藤寫真館。

下田正一

1914《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》，臺北：下田寫真館。

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

1915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第1卷，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（中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

1996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第一卷泰雅族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）

1917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第4冊紗積族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（中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2011，同書名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）

1918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第5冊大天族前篇，臺北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（中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2012，同書名泰雅族前篇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）

1920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第7冊大天族前篇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（中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2010，同書名泰雅族前篇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）

森丑之助

1915《台湾蕃族圖譜》第1-2卷，臺北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[復刻：2014(1994)，宋文薰編譯，同書名，臺北：南天書局。]

1917《台湾蕃族志》第1卷，臺北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。[復刻：1996，同書名，臺北：南天書局。]

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

1918《蕃社戶口》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。

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

1921《理蕃誌稿》第2卷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。[復刻：1989，同書名，東京：青史社。]（中譯：1997，陳金田譯，《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務稿》第2卷（上卷），宋建和譯（下卷），南投市：省文獻委員會。）

臺灣日日新報社

1921年〈所謂六人組的態度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5月21日日刊2版，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社。

入澤滲

1922《生蕃國の今昔》，臺北：臺灣蕃界研究會。[復刻：2010，同書名，臺北：成文社。]

波越重之、松室謙太郎編

1923《臺北州理蕃誌》1-4卷，臺北：臺北州警務部。（中譯：莊振榮、莊芳玲，2014，同書名（舊宜蘭廳），宜蘭縣：宜蘭縣縣史館、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）

藤崎濟之助

1928《臺灣全誌》（樺山資紀），東京：中文館書店。[復刻：2008，同書名，東京：ゆまに書房。]

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

1931《高砂族調查書・蕃社概況》第5冊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。（中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2011，同書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）

1932-1943《理蕃の友》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。[復刻：1993，《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》第1~3卷，東京：綠蔭書房。]

小森德治

1933《佐久間左馬太》，臺北：臺灣救濟團。[復刻：2008，同書名，東京：ゆまに書房。]

高橋政吉

1934〈臺北州理蕃の今昔〉，《理蕃の友》第3年1月號，頁5-6。[復刻：1993，《理蕃の友》第1卷，東京：綠蔭書房。]

樺澤重次郎

1935〈ガオガン討伐の思出〉，《理蕃の友》第4年6月號，頁9-10。[復刻：1993，《理蕃の友》第一卷，東京：綠蔭書房。]

臺北帝國大學土俗・人種學研究室

1935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，東京：刀江書院。[復刻：1988，《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凱風社。1996，《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の研究》，臺北：南天書局。]（中譯：2011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・人種學研究室原著，楊南郡譯注，《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》第1冊第2冊，臺北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南天書局。）

二、文獻（依筆畫順序排列）

大谷正

2019〈遠藤写真館と台湾〉，《専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月報》台湾総合研究特集号，頁49-82，東京：日本専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発行。

山辺健太郎

1971《台湾》，東京：みすず書房。

山路勝彦

2011《台湾タイヤル族の100年—漂流する伝統、蛇行する近代、脱植民地化への道のり》，東京：風響社。

井上祐子

2012《日清日露戦争と写真報道——場を駆ける写真師たち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。

王學新

2001《日據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》。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
田原総一郎

2000《日本の戦争》，東京：小学館。

向山寛夫

1987《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》，東京：中央経済研究所。（中譯：楊鴻儒、陳蒼杰、沈永嘉譯，1999，《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民族運動史》，臺北：福祿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。）

吳政憲

2019〈「掩堡」—近代臺灣隘勇線硬體設施之研究（1906-1914）〉，《興大人文學報》62：頁1-22。

近藤正己

2015〈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軍隊と植民地戦争〉，坂本悠一編，《地域の中の軍隊》7：頁44-74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。

林修澈主編

2018《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》，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林玉茹、詹素娟、陳志豪主編

2015《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。

保羅D. 巴克萊著，堯嘉寧譯

2020《帝國棄民：日本在臺灣「蕃界」內的統治（1874-1945）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
洪廣冀

2019〈「蕃地」開發、「蕃人」控制及臺灣原住民族群性的展現：以蘭陽溪中上游地域為中心（上）（下）〉，《考古人類學刊》90：1-44，91：頁1-42。

徐榮春

2015〈李棟山事件的火藥庫——日治時期，國家與泰雅族馬武督部落的土地流動〉，《原住民族文獻第21期》，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清水純

2014《画像が語る台湾原住民の歴史と文化：鳥居龍蔵・浅井恵倫撮影の探求》，東京：風響社。

許進發、魏德文

1996〈日治時代臺灣原住民影像（寫真）紀錄概述〉，《臺灣史料研究》7：頁19-44，吳三連基金會。

陳柏棕

〈被觀看的容顏：「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臺灣寫真」中的原住民族〉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頁資料（2021年8月查閱）。

陳靜寬

2008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之臺灣歷史文物資料〉，《臺灣學研究》6：頁123-136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。

陳聰民等編

2005《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：七腳川事件寫真帖》，南投：臺灣文獻館／臺北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黃智慧

1994〈鳥居龍蔵の生涯〉，遠流出版社臺灣館編《跨越世紀的影像》，頁21-32，臺北：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。

1996〈泰雅族與其拼音書寫系統〉，黃榮泉合著，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》中譯本，頁9-19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
黃國正

2007〈用老照片閱讀臺灣歷史——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寫真帖之利用價值〉，《臺灣學研究》3，頁57-65。

菊池一隆

2017《台湾北部タイヤル族から見た近現代史-日本植民地時代から国民党政権時代の「白色テロ」へ》，福岡：集広舎。

傅琪貽（藤井志津枝）

2019《大科坎事件1900-1910》，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鄭光博主編

2017《Lmuhuw語典：泰雅族口述傳統重要語彙匯編①》，臺中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。

鄭安晞

2012〈隘制、番界/蕃界與原住民傳統領域（1875-1920）研究回顧兼論研究方法〉，《政大民族報》30期，頁109-142。

2012〈日治時期推進隘勇線與蕃界之內涵轉變〉，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》（50期），頁131-208。

2014〈日治時期隘勇線的施設與消失〉，《臺灣史學雜誌》16，頁80-108。

劉澤民

2017〈「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」與馬里科灣原住民抗日事蹟探討〉，《臺灣文獻》68，頁39-91。

檜山幸夫

2011〈日台戰爭論——台湾接取時における台湾での戦争の呼称問題を中心に——〉，《帝国日本の展開と台湾》，東京：創泉堂，頁3-87。

鴻義章

2016《太魯閣事件》，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簡永彬等著

2019《凝視時代：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》，臺北：遠足文化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／遠藤寬哉著；陳怡如翻譯。

-- 初版。-- 南投市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2021.11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0724-57-8(平裝)

1. 攝影集

957.9

110018054

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

發行人 張鴻銘
行政指導 黃宏森 林明洲
原 著 遠藤寬哉
編 譯 陳怡如
監譯導讀 黃智慧
審 訂 詹素娟 鄭安晞
策 劃 胡斐穎
行政編輯 陳惠芳 陳隼東
出版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
地 址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4號
電 話 (049)2316881
傳 真 (049)2317783
網 站 <https://www.th.gov.tw>
印製經銷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 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50號11樓-1
電 話 (02)2752-5618
傳 真 (02)2752-5619

I S B N 978-986-0724-57-8

G P N 1011001916

初 版 2021年11月

定 價 新臺幣400元(平裝)

展 售 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

地 址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(02)25180207

網 站 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

地 址 臺中市中山路6號(火車站旁)(04)22260330

網 站 <http://www.wunanbooks.com.tw>